

浅议唐朝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

——以唐朝与突厥的关系为例

何春明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09)

[摘要]从唐朝与突厥、吐蕃的互动关系中可以看出,唐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坚持了三条原则,即核心利益至上原则、利益最大化原则、政治优先原则。这三条原则并不是地位均等的原则,核心利益至上原则是唐朝处理民族关系的刚性原则,不容动摇。利益最大化、政治优先原则是柔性原则,可以因时因事制宜,变通执行。

[关键词]唐朝 处理 民族关系 原则

唐朝时期,在中央王朝的四周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东北主要有契丹、奚、室韦和靺鞨,西北主要有突厥、回纥、吐谷浑,西南主要有吐蕃、南诏。在华夏大地之外,还有高丽、天竺、波斯、大食、尸利佛誓、真腊、河陵、林邑等境外民族政权。这些政权不同程度地与唐朝保持着或战或和、或远或近、或亲或疏的关系,有的是唐朝的友好邻邦,有的则是虎狼劲敌,对唐构成了严重威胁。唐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上,坚持什么原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试着从分析唐朝与突厥之间的动态关系入手来总结唐处理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

一、核心利益至上原则

唐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始终恪守一条底线,那就是不能损害自身核心利益——唐朝的政权稳定和国家统一。凡是有碍于唐朝政权稳定和国家统一的,不管对方是友是敌,唐朝统治者都会毫不含糊、不惜代价地采取果断措施来排除甚至消灭之。这可以从唐与突厥的关系中得到印证。

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初,整个中原地区局势动荡,一度统一强大的隋朝土崩瓦解,天下群雄并起,割据林立,据载当时的中原是“相聚萑蒲,猬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者千百成群”^①。而此时北方的强邻突厥族,再度崛起,雄霸一方,“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②,甚至“华人多往依之”^③。由于李渊起兵前曾任太原留守,“北备边朔”^④,曾与突厥数次交锋,对突厥的军力了解较深,所以他“比其他人更认识到欲取天下,先必与突厥媾和的迫切与重要”^⑤。因此,李渊主动向突厥示好,争取支持,他在给始毕可汗书信中说:“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圣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通和,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其中。”^⑥始毕可汗也看到隋朝大势已去,崩溃在即,因此顺水推舟,建议李渊废隋主自立,并表示“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⑦,并“遣其柱国康鞘利、级失热特勤等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仍许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⑧

在李渊起兵后,突厥也确实履行承诺,始毕可汗发兵送李渊入关,多少随所欲,并且曾“遣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⑨这二千突厥精骑初至即“遂下韩城”^⑩破屈突通。尔后又参与唐削平群雄的统一战争,数年奔波“从平京师”。处罗可汗时,也曾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配合唐军,击败刘武周。应该说,李氏家族能在较短时间内力挫群雄,顺利建唐,跟突厥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从这一点看,突厥对李氏家族是有恩德的,对唐朝的建立是有功劳的。

李唐势力的迅速崛起,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原王朝即将再

度出现时,突厥统治者意识到李唐王朝一旦完成统一大业,必对突厥不利,因此突厥改变了对李唐的支持政策,转向支持李唐的敌对势力并对唐朝发动战争。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二月突厥处罗可汗继位。处罗即位不久就数次侵唐边境。是年八月,处罗遣数千骑与梁师都寇延州,十一月,又以梁师都为乡导,谋大举入寇。随着唐朝政治军事实力的增长,唐统一中原的趋势日趋明朗,这促使突厥加大了侵唐的频率与力度,以阻碍唐朝消灭割据、实现统一的步伐。这样“唐与突厥矛盾进一步激化,突厥对唐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呈现出次数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的趋势”^⑪。主要表现在:一是协助与唐对立的其他割据势力如刘黑闥、刘武周、苑君璋等。如: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与马邑苑君璋合兵攻雁门。五年(公元622年)春,遣数万骑与刘黑闥合军围攻唐将李大恩,致使“王师败绩,李大恩殁于阵,死者数千人。”^⑫当这些割据势力失败后,突厥又为他们提供政治庇护,帮助他们东山再起。如,五年三月,李世民败刘黑闥于洛水之上,刘黑闥即亡奔突厥,且借突厥兵力,卷土重来,“六月引突厥万余骑入抄河北”^⑬在支持李唐敌对势力的同时,突厥还直接出兵侵唐,如:武德四年四月,颉利“自率万骑攻雁门”;五年六月“自率五万骑南侵至于汾州,又遣数千骑南侵西入灵、原等州……攻围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余口”^⑭,同年八月“丙辰,颉利寇雁门,已未进寇朔州”,六年秋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⑮。不管是协助和扶持唐的敌对势力,还是直接入侵,都是突厥对唐政策的转变的具体体现。突厥改变对唐政策的原因,是突厥害怕唐崛起后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因此他由助唐的立场转变到反唐甚至攻唐的立场,企图阻挠一个统一的强盛的中原政权的出现,继续维持中原分裂割据的局面。武德七年(公元623年),唐平定了除梁师都外的各割据势力,天下初定。颉利的侵略规模更甚,自武德七年至九年,突厥大规模侵边每年一次。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奉国入寇”,八年七月,“颉利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又袭将军张瑾于太原,瑾全军并没”,九年七月,“颉利自率十余万骑进寇武功,京师戒严”^⑯。突厥的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唐朝的核心利益——唐朝政权的巩固和大局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昔日有恩于己的友邦,唐朝政府也毫不客气、毫不犹豫地对突厥采取军事行动,予以反攻打击。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冬,唐太宗命李世勣、李靖、柴绍、李道宗、薛万均、卫孝节等十总管兵力十余万分道大举进攻突厥,次年在白道大败突厥军,其部众如突利、康苏密等纷纷来降。唐军乘胜追击,生俘颉利可汗,俘其众十余万,灭亡东突厥。

二、利益最大化原则

(一)以夷攻夷、明哲保身

为了达到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胜利,唐朝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时,通常采用“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的方针。如,唐高宗在讨伐反唐的西突厥贺鲁时,采用了骆弘义“安中国以信,夷狄以权”的建议,征发回纥、处月、处蜜及契苾等部落的军队猛攻贺鲁,唐朝大军驻凭洛水助阵,在交战时刻,“胡骑出前,唐兵摄后”,取得讨伐贺鲁的胜利,达到“驱率戎狄,攻彼豺狼,失则无损国家,利则功归社稷”^[15]理想效果。武则天时,陈子昂就周边民族政权互相攻战之事提出了“夷狄相攻,中国之福”论断。唐中宗时,右补阙卢僊直接向中宗提出“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长算”的观点,并用历史事实加以佐证说明:“陈汤统西域而郅支灭,常惠用乌孙而匈奴败。请购辩勇之士,班傅之俦,旁结诸蕃,与图攻取,此又犄角之势也”^[16]。唐朝在“以夷攻夷”上,常是让蕃将带兵打仗,以夷兵攻打夷兵,如,唐太宗重用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唐玄宗重用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武则天用突厥默啜可汗之兵攻打契丹等,这种“以夷攻夷”、明哲保身的做法,是唐朝实施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典型体现。

(二)以夷制夷、坐收渔利

所谓“以夷制夷”就是指利用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或者少数民族政权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让其相互牵制、互相制约,使其处在动态平衡之中,弱化其军事政治力量,分散其注意力,削弱其战斗力,来分化瓦解其中一方对唐的军事进攻或威胁,从而达到维护唐朝自身的政治军事安全和维持唐朝对少数民族控制的政治目的。唐朝统治阶级中有不少人认识到“以夷制夷”的长处,如贞观名臣李百药,他在《安置突厥议》中指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使不相臣属,纵欲存立阿史那氏,惟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国分则弱而易制,执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比不能抗衡中国矣。”^[17]又如陈子昂分析少数民族政权相互牵制对唐王朝的益处时认为:“国家所制十姓者,繇九姓强大,臣服中国,故势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丧乱,君长无主,回纥残破,磧北诸姓,已非国有,欲踰角亡叛,唯金山诸蕃共为形势。”^[18]统治阶级很多情况下也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方式处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如武德三年(620年),唐高祖为了解除东突厥的威胁,便对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厚加抚结,与之并力以图北蕃,统叶护许以五年冬。”又如武德七年八月,突厥可汗颉利、突利率兵“举国入侵,边营南上”,陇东几乎全被突厥占领,李世民率兵迎敌,双方在鹵州相遇,世民率百骑前往突厥阵前,离间颉利、突利,“颉利欲战,突利不可”,世民与突利结为兄弟,突厥兵退。《旧唐书·铁勒传》载:“平突厥颉利之后,朔塞空虚,夷男率其部东返故国,建庭于都尉犍山北,独逻河之南,在京师北三千三百里,东至室韦,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临瀚海,即故匈奴之故地,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为南北部。太宗以其强盛,恐为后患,十二年(公元638年),遣使备礼册命,拜其二子结皆为小可汗,外示优崇,实欲分其势也。”^[19]太宗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优崇夷男家族是幌子,真实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册立夷男二子,使其相互牵制、甚至相互争斗,以达到削弱薛延陀的势力,便于唐朝对薛延陀的控制。实践也证明,太宗的做法是正确的,达到了对薛延陀的控制,夷男死后,二子相互争斗,互相残杀,诸姓俟斤“递相攻击,各遣使归命。”

唐太宗之后,唐朝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也沿袭了“以夷制夷”的方式。如唐高宗就分别册立西突厥的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并令他们各领所部,“赤心向国”^[20]。唐玄宗时,东、西突厥使者先后到达长安,玄宗设宴欢迎。在宴席座次安排上,双方发生争执,东突厥的使者认为,“突骑施国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而苏禄的使者则认为,“今日此宴,乃为我设,不合居下。”^[21]最后,唐

玄宗让他们分坐于东西幕下,不分高低。表面上看是调解他们的座次纠纷,实际上是暗示东西突厥的地位平等,不相统属,以相牵制。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使少数民族力量在内部或彼此间消耗掉了,中央王朝则不动一兵一卒,坐收渔翁之利,胜之于无形。

(三)以夷治夷,以逸待劳

所谓“以夷治夷”,就是让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的羁縻方式。唐朝在隋朝已有的“以夷治夷”基础上,继续推行和完善“以夷治夷”。唐高祖在武德二年(619年)二月就颁布诏书,大致规定了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其核心就是“追革前弊,要荒藩服”,“怀柔远人,义在羁縻”,“分命行人,就申好睦”。从隋唐民族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将“以夷治夷”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正是隋唐两朝统治者的明智之处。”^[22]唐太宗时的中书侍郎颜师古一语道破了“以夷治夷”的天机。他认为“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言其恍惚,来去无常也,饱则飞去,饥则附人。今速欲改其习性,同此华风,于事为难,理必不可,当因其习俗抚驭之。”^[23]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是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慢慢积淀而成,改变其习性,实属难事。如果少数民族本身不主动要求改变,若要通过外力强行改变,不仅难以奏效,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引起反抗。因此,“以夷治夷”——设置羁縻府州是在当时情况下处理民族关系比较理想的方式之一。唐高祖入关时,曾令韦仁寿“检校南宁州都督,寄听政于越隋,使每岁一至其地以慰之。仁寿将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县,授其渠帅为牧宰,法令肃清,人怀欢心。”^[24]唐高祖在南方设置的羁縻府州很多,有黎州、曾州、宗州、盘州、牂州、矩州等,在北方设置的羁縻府州有慎州、鲜州、涂州等。太宗继位后,也设置了很多的羁縻府州,在西南、东北、西北方民族地区均设置羁縻府州,“因其习俗抚驭之”。如在平定东突厥后,“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25]到玄宗时,羁縻府州的数量更多,到开元年间,唐王朝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南和南方至少设置了856个羁縻府州,是开元时内地府州328个的2.6倍^[26]。这些羁縻府州的设置,既顺应了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社会特点,又有效地发挥了少数民族自我管理的积极性,既省去了唐朝的不少心力,又缓和了双方的矛盾,有效地维护了当地的稳定,取得了以逸待劳的良好成效。

三、政治优先原则

唐朝与周边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联系和交往,在这种联系和交往中,唐朝始终坚持政治优先原则,即唐朝统治者始终把周边民族在政治上对唐的尊重、归顺和臣服作为交往和联系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对方在政治上尊重或归顺、臣服唐朝的基础上,唐才与其进行其他领域的合作与往来。

中国很早就存在“夷夏观念”,“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萌芽状态的民族主义也产生了,古人称为‘夷夏之辨’”^[27]。这种“夷夏之辨”实际就是“中心”与“边鄙”的区别和“宗主”与“藩属”的区分。另外,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认为本国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与国家只不过是蛮夷或狄居处的化外之地,自己才是“天朝上国”,是世界的中心,故自称“中国”、“中华”。这种初始的夷夏观念演变到汉唐时,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统治者和黎民百姓心中一种自觉的自然的存在——牢不可破的“中心意识”。客观上说,当时的唐朝无论在人口、领土还是在综合国力上都是不容置疑的东方大帝国。势力的强盛和影响的广泛,使唐朝统治者的“中心意识”更加膨胀。在“中心意识”的支配下,唐朝统治者很自然地将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

关系定位为“中心”与“边鄙”的主次关系和“宗主”与“藩属”从属关系。在唐统治者看来,“边鄙”之国欲与“中心”之国交往,“藩属”欲与“宗主”往来,很自然要在政治上表现出对唐朝的尊重、归顺和臣服。而体现尊重、归顺和臣服的最好方式就是朝贡,“中国历代统治者视朝贡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中外交往的诸多形式一概被冠以朝贡之名”^[28]。“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29]因此,唐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联系交往中,很多事情都被贴上了“朝贡”的标签。在实践中,唐朝也尽量为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来华朝贡创造良好条件和便利,对肯来朝贡的国家和民族持宽容态度,甚至与之冰释前嫌,消除恩怨,“凡肯朝贡的国家、地区、部族,不论远近,不论是否有过恩怨前嫌,一概慨然接纳。”^[30]

唐朝之所以能坚持政治优先原则,这是由唐朝强大的综合国力和深远的影响决定的。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国力雄厚,四夷宾服。“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31]宋人评论说:“唐之德大矣!际天之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远君长,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32]在此情形下,四周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愿意交结和好,“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33]。

由于唐朝统治者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联系交往中,坚持政治优先原则,把政治上对唐的尊重、归顺和臣服放到了首要位置,因此,其“对外交往不仅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相反,还以经济的付出换取朝贡来仪的名义”^[34]。唐朝为了体现“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大国风范,造就“四夷顺而天下宁”,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很多时候都是不惜代价、不吝财富的,正如西汉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义不计其功”。一是奖励贡使,唐朝对前来朝贡的使节与商人,均予嘉奖,有的封官,有的给予回赐。如阿拉伯人朝贡得到回赐的,我国史书上有多次记载,如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大食遣其将苏黎等12人来献方物。并授果毅,赐绯袍银带;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大食遣使来朝,且献方物。赐帛百匹;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黑衣大食遣大酋望25人来朝,并授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另外,在朝贡中,阿拉伯使者被授予“郎将”、“左金吾卫将军”、“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中郎将”等名誉职称的,也达七次之多^[35]。又如唐朝对波斯贡使的回赐,如开元五年(公元717年),罗和异国大城主郎将波斯阿拔来朝。赐帛百匹,锦袍银带,及薄寒马一匹;开元十年(公元722年),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僧及烈朝贡,授首领为果毅,赐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二是从优安排贡后事宜。史称蕃国朝贡,“中国有报赠、册吊、程粮、传驿之费,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革末、靺鞨,谓之‘八蕃’,其外谓之‘绝域’,视地远近而给费”^[36]。“报赠”即对朝贡贡品的酬答与赐赠,且“计价酬答,务从优厚”^[37],以不失远人“向化”之心。“册吊”指唐朝对朝贡蕃国君长的册封或吊唁。“程粮”乃贡使回国时,按路途远近支付其食粮。

由于唐朝过于追求政治名誉,不重经济利益,不计经济成本,使得前来朝贡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不少个体蕃商也借朝贡之名来华贸易,因此四夷“进奉”之物的数额越来越大,沿途“贡物”的转运,就成了唐朝政府的一大负担,馆驿往往不堪重负。元和初李绛称:“若进奉货物悉令馆驿递送,岂唯馆驿不济,实虑州县难堪,财货数多,差夫递送,便须防援,转益劳烦,……实致扰人之弊”^[38]。为此,唐朝政府不得不限进京贡使人数,“海外诸蕃朝贺进贡使有下从,留其半于境;繇海路朝者,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39]。

四、结语

纵观唐代历史,唐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核心利益至上、利益最大化、政治优先三大原则并不是地位均等的原则,其中核心利益至上原则是唐朝处理民族关系的刚性原则,不容动摇。利益最大化、政治优先原则则是柔性原则,可以因时因事制宜,变通执行。如唐高祖太原起兵之初,遣使向突厥称臣,唐对突厥也以宗主国自居,“每遣使至,多横暴”,“言词悖傲,求请无厌”等骄傲和无理行为隐忍以待,“每优容之”等^[40],就是唐朝统治者变通执行政治优先原则的有力佐证。

注释:

- (1)《隋书》卷4《炀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页。
- (2)《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28页。
- (3)《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第6028页。
- (4)《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页。
- (5)曹治怀:《唐初唐与突厥关系的发展演变》,《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
- (6)《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6页。
- (7)《资治通鉴》卷184,隋纪8,恭帝义宁元年(617)六月己卯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738页。
- (8)《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7页。
- (9)曹治怀:《唐初唐与突厥关系的发展演变》,《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
- (10)《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56页。
- (11)《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上》,第5156页。
- (12)《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上》,第5156页。
- (13)《旧唐书》卷1《高祖纪》,第14页。
- (14)《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上》,第5157页。
- (15)《全唐文》卷186《骆宏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8页。
- (16)《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上》,第5171页。
- (17)《全唐文》卷142《李百药》,第143页。
- (18)《新唐书》卷107《陈子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67页。
- (19)《旧唐书》卷199《北狄传·铁勒》,第5344页。
- (20)《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下》,第5188页。
- (21)《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下》,第5192页。
- (22)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和“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 (23)《唐会要》卷73《安北都护府》,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 (24)《册府元龟》卷692,北京:中华书局。
- (25)《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上》,第5163页。
- (26)《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七下》,第1119页。
- (27)常金仓:《“夷夏之辨”与“以德怀远”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3月第1期。
- (28)李云泉:《汉唐中外朝贡制度述论》,《东方论坛》2002年第6期。
- (29)李云泉:《汉唐中外朝贡制度述论》,《东方论坛》2002年第6期。
- (30)李云泉:《汉唐中外朝贡制度述论》,《东方论坛》2002年第6期。
- (31)《通典》卷188《边防四·南蛮下·海南序略》,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 (32)《新唐书》卷219《北狄传·赞》,第6183页。
- (33)《资治通鉴》卷198,唐纪14,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戊申条,第6253页。
- (34)齐涛:《朝贡外交与朝贡贸易》,《学习时报》2004年11月8日。
- (35)参见杨怀中《唐代的番客》,该文载《伊斯兰教在中国》,第11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36)《新唐书》卷221《西域传·赞》,第6264页。
- (37)《册府元龟》卷168《帝王部·却贡献》。
- (38)《全唐文》卷646《李绛·论许遂振进奉请驿递至上都状》。
- (39)《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第1257页。
- (40)观点参见曹治怀:《唐初唐与突厥关系的发展演变》,《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

作者简介:何春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